

红色档案

李东

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黄允升
陈铭康
沈学明
唐宝林 著



西苑出版社

红色档案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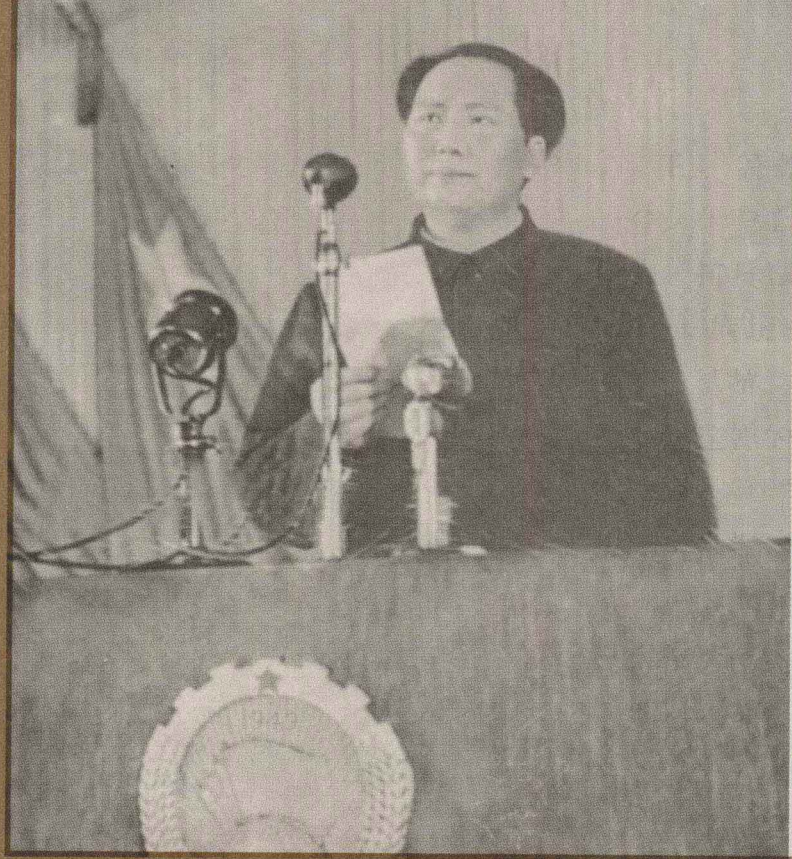
黄允升 沈学明
陈铭康 唐宝林 著

西苑出版社



毛泽东与李立三

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李立三还是我们的同志。



毛泽东与李立三，同前面讲过的毛泽东与陈独秀、瞿秋白比较又有不同的特点。他们都出生在民族灾难深重的19世纪末期。他们是湖南的同乡，一个家在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家在醴陵县阳三石。毛泽东虽比李立三年长六岁，由于上学较迟，所以差不多同时间进入湖南省城读书。他们同是爱国的热血青年，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求知识、交朋友中于1915年相遇。李立三响应毛泽东的“征友启事”，两人初次相识，但因年龄相差较大，知识深浅也不相同，使得互相交谈不起来。毛泽东后来同斯诺谈话中讲到，“征友启事”只有三个半人响应，所谓“半”个就是当时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李立三。

几年后，他们追求革命真理，选择了不同的途径。李立三于1919年秋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立足国内了解国情和学习翻

译过来的新书籍。几乎在同时，他们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底李立三回国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书记。这时，毛泽东与李立三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毛泽东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李立三依据毛泽东的主张与部署，具体组织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中的一次成功的创举。这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随后中央即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调李立三到武汉工作。在国共合作形成后，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而李立三则运用安源工运的经验，在上海、武汉地区领导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党内的地位不断地上升。



中共六大以后，李立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由于总书记是由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李立三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此时，毛泽东与李立三则成了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李立三贯彻中共六大决议，大大促进了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也正确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解决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问题，为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然而，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时，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而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第一线，从实际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一些“左”的指示，不仅使红军避免了

“左”倾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失，反而较大地发展了红军的力量。随后，他又指挥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粉碎了当时国民党十万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为创建中央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他在与李立三的共同战斗中，既总结了正面的经验，也总结了李立三犯错误的反面经验，并且进一步升华，基本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以，毛泽东的成功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与李立三革命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分不开。本编就是研究与探讨这个问题的。

志同道合 救国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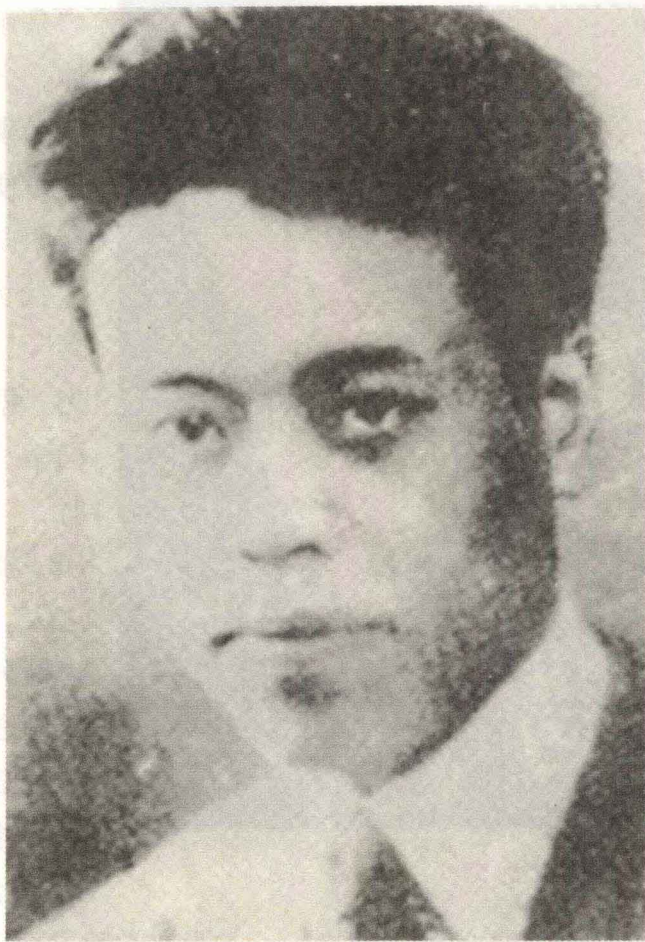
“征友启事”和“半个人”

1915年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主要学校发出“征友启事”。人们对这一举动不甚理解，响应者寥寥，但李立三却前往和毛泽东见了面，这是他们之间的初次相识。

那时，毛泽东在长沙是小有名气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中国正处在动荡的年代。国际上，风云变幻，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南北各派军阀对峙，你争我夺，混战不休。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中华民族的耻辱和苦难，深深地刺痛着当时整个一代的爱国青年的心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勤奋好学，不断追求新的思想，具有了坚定的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他的政治观念，“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了。

毛泽东当时的重要活动是为研究学问、探索救国之道而团结同志。在1915年暑假过后，他感到需要突破校内这个狭小的圈子，向校外更大的范围去物色更多的朋友，于是发出了“征友启事”的广告，署名“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是毛泽东三个繁体字的笔画数。



李立三

“征友启事”的内容大意是：要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牺牲的青年。启事引《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毛泽东自己将启事刻蜡版油印，寄发长沙部分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有“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等字句。这年9月27日，他写信给同学萧子升说：“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他求友的心情甚切，是因为他认为要有渊博的学识和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就必须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

在响应“征友启事”当中，有一个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浏阳人罗章龙（那时叫罗璈阶），他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看到了启事。它



罗章龙

“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罗章龙看后觉得启事的文情真挚，颇为感动，于是便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交朋友。过了三天得到复信，说“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并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会见。据罗章龙回忆，他拉了一个同学一起去，当他们到达图书馆时，“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器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这次罗章龙和毛泽东的会晤，谈了三个小时，“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

“关于治学问题，润之……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付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从毛泽东同罗章龙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知识相当渊博，思想颇有见地的青年了。

1915年，李立三也在长沙读书。罗章龙是李立三当时结交的要好朋友。经罗章龙的介绍，李立三也响应“征友启事”去拜访毛泽东。

李立三所以响应“征友启事”，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他在长沙求学时，也是一个对国家前途充满忧患意识的爱国青年。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他刚生下时，适逢在他家屋前一株凤尾蕉开了花，家里人认为是大吉大利，取乳名叫凤生。到了上学年龄，他父亲按祠堂的字辈，将凤生改为隆郅。李立三从小聪明好学，争强好胜。他父亲不喜欢儿子的性格，对他严加管教。在他幼年时就被送进蒙童馆读四书五

经，但他常常偷偷阅读《水浒》、《精忠传》、《三国演义》之类的“杂书”。不久，蒙童馆改为醴陵县立渌江初级小学，李立三成为这所新式学校的学生，但每天还得遵从父亲的意旨，阅读指定的古书。在1906年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失败之后，李立三在学馆结识了一位同盟会会员，听到一些革命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对反清烈士崇敬之情。辛亥革命后，李立三越级升入醴陵渌江中学。但不久就开始了连年的军阀混战。醴陵地处交通要冲，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这里是必争之地。少年时代的李立三，眼看国无安宁之日、人民流离失所，逐渐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情绪。他为自己起了个“忧国子”的笔名，写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和感想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围观的同学看了都颇为感动。

1915年，醴陵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长郡中学。于是，李立三离开家乡来到长沙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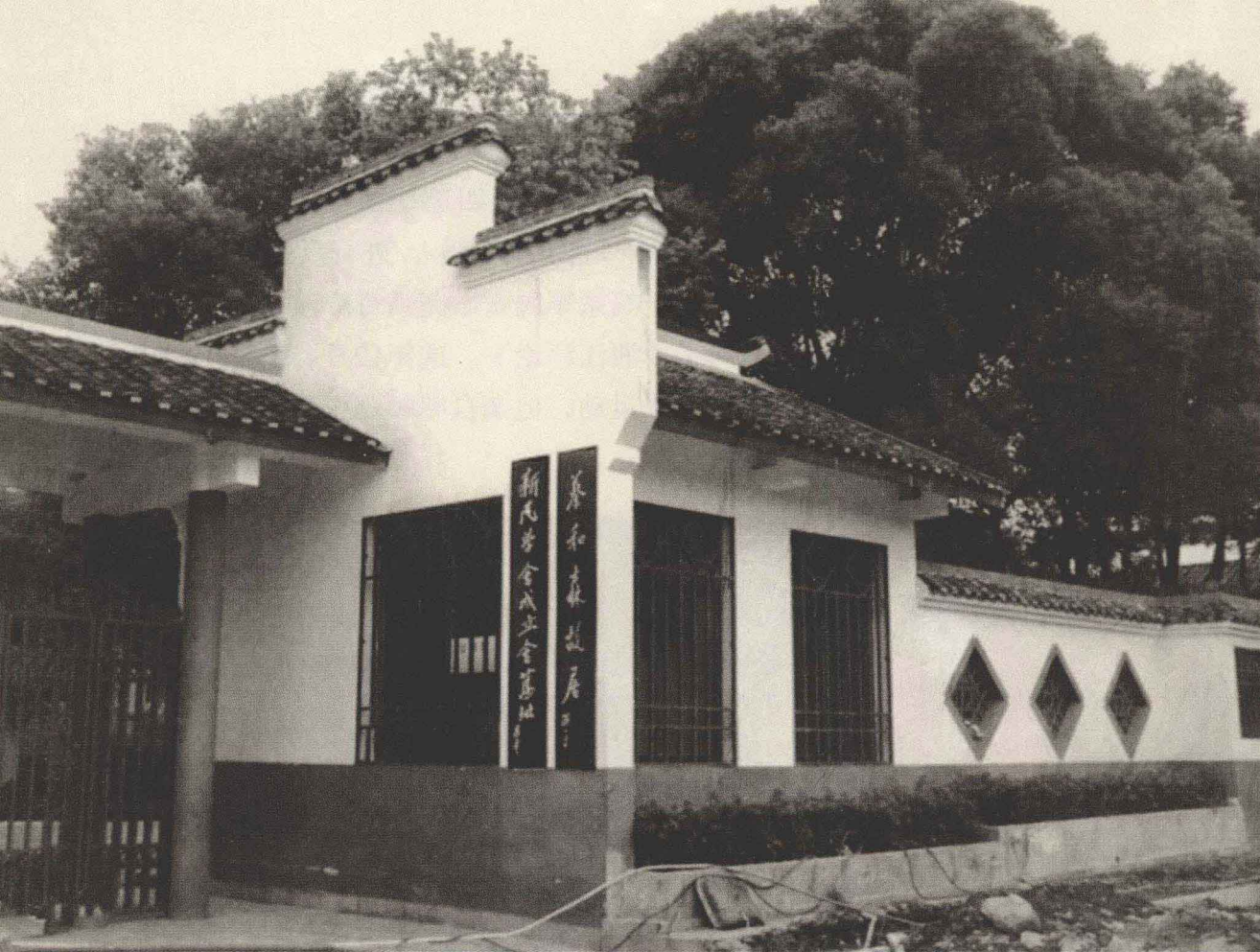
青少年时期的李立三是个热情奔放的人，经罗章龙介绍后，他也没有深思熟虑，就去响应“征友启事”。李立三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时，李立三才16岁，毛泽东比他年长6岁。这时的毛泽东正是风华正茂，志向不凡，他侃侃谈论国家大事和读书修身的看法。李立三觉得毛泽东已是一位大先生，自己则是刚从县城来到省城长沙的小学生。两人初次见面，知识面相差较大，互相交谈不起来。李立三一时语塞，又有些拘束，没有说什么话，就离开了。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他的一张“征友启事”得到回答的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很显然，那时毛泽东同李立三相比，学识上更加渊博，政治上更有见解，以至使李立三无法同毛泽东交谈。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在这次会见后发展起来。

但不管怎样，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后，有几个人来应征或来信表示愿意联系，这已使他感到高兴和快慰。这一年11月9日，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暑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分途寻求革命真理

毛泽东和李立三分手后，继续有目的地去寻找革命青年，逐渐在自己周围聚集了20多个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在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一道，积极组织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那时，李立三是赴法勤工俭学的一员。他于1917年春中学毕业后，曾经一度投奔程潜的护国军，当了一名士兵。1919年春，他得到程潜的资助，来到北京读书，进了法文专修馆的留法预备班。这年秋天，李立三从上海启程出发，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航程。此时，毛泽东与李立三，一个在国内，一个去异国他乡，各自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的。法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多次在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等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17年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构。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将这个信息写信告诉了毛泽东和蔡和森。这时，湖南政局极为混乱，“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而且，新民学会刚成立，许多会员感到需要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觉得赴法勤工俭学是一条出路，于是新民学会在1918年6月下旬召开了会议，专门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这次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



长沙新民学会旧址

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当尽力进行。会后，毛泽东提议蔡和森赴北京与有关方面联系，他自己在长沙负责发动和组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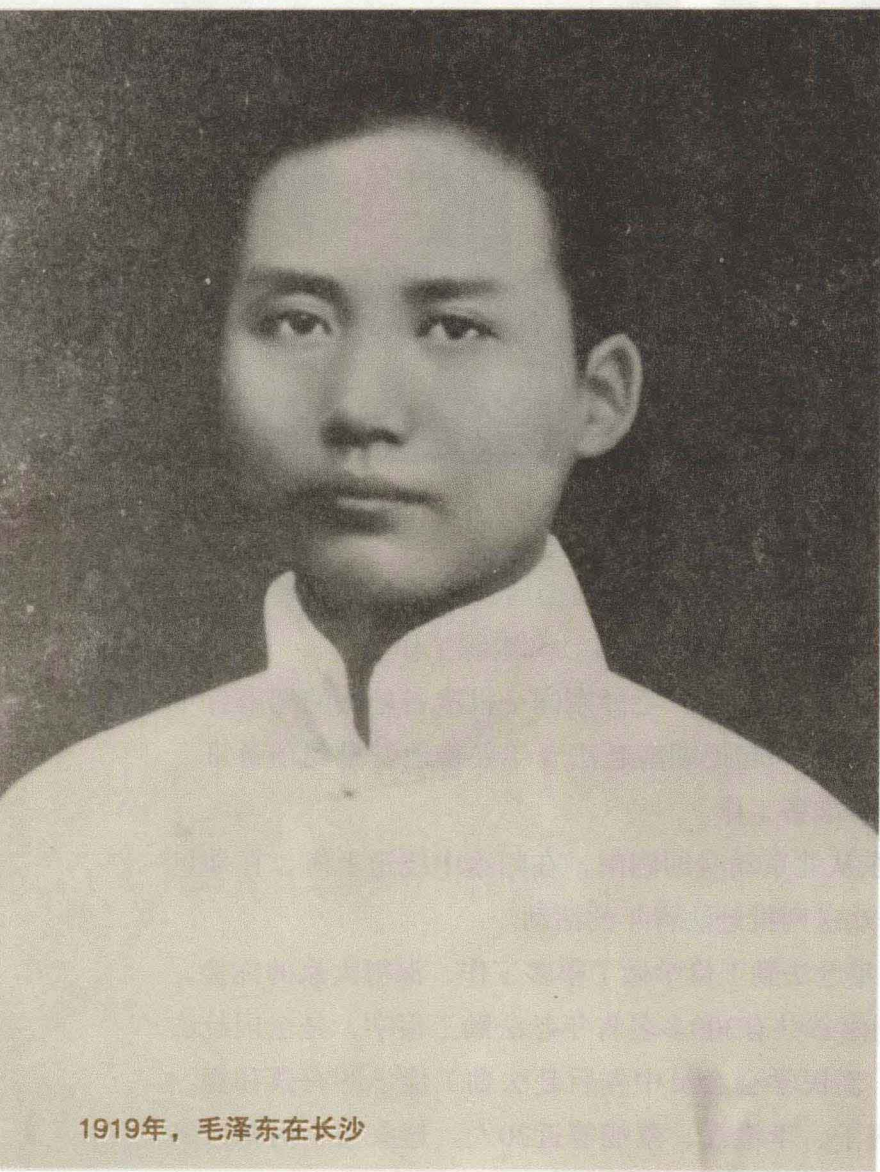
8月，在蔡和森一再来信催促下，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接着，和蔡和森一起把湖南赴法青年妥善地安排到预备班，并为他们的出国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1919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在归途中绕道上海，在那里20多天中，接连参加了欢送两批赴法青年的活动。

毛泽东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做了很多工作，深得大家的称赞。到1919年和1920年，湖南省共有300多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是全国赴法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新民学会会员中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有蔡和森、罗学瓚、张昆弟、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近20人。这些人，后来大多

数都成为中国革命的积极分子或骨干。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并主编《湘江评论》，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这时，作恶多端的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强行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禁止爱国运动，并查封了《湘江评论》。这年12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发动湖南人民开展驱张运动，他亲自率领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到北京时，已经吸收了许多新思想，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次在北京，又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邓中夏等有了密切的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而且他自己还热心地搜集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这时，他思想上已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北京去上海。

他在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研究了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还讨论了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向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信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而且又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称“南陈北李”。毛泽东第二次北游期间，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又得到他们的启迪和帮助，从此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后来他回忆时谈到：“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冬至1921年初，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李立三在五四运动以后，怀着追求新思想的热情，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去探寻革命真理。1919年10月，他在上海搭船前往法国。在度过40多天颠簸的海上生活后，到达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接着，经巴黎来到蒙达尼，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蒙达尼是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一座风光美丽的小城镇，蔡和森抵达法国后，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活动中心也在这个地方。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共产党已经建立，各种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大量印行，工人运动也相当活跃。李立三刚到法国时，曾经一度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不久，他熟练地掌握了法语，在读了法共《人道报》等进步报刊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思想上有了变化。特别是，后来在圣夏门一家铁工厂做工，受到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逐渐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

1921年2月，李立三和赵世炎等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中开展革命活动。劳动学会在酝酿建立时，曾经准备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会员中意见分歧，有人当时还未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才叫做劳动学会。在这之前，勤工俭学生在法国组织的革命团体已有以蔡和森为首的旅法新民学会，以李维汉、张昆弟为首的工学世界社等。这些社团的组成，为后来中共旅欧党团的建立，从思想上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改造的办法，却产生意见分歧。蔡和森等主张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些会员则主张用教育作工具，实行“温和革命”。8月，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分别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是与会会员向警予、熊琨甫、唐灵运、蔡畅、曾琦、蔡和森、侯昌国、萧子升、熊叔彬等的合影。



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劳动学会成立后不久，李立三、赵世炎等又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很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赵世炎和李立三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而劳动学会则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核心。

勤工俭学学会建立后，李立三带领第一批学生一百多人来到克鲁邹施乃德钢铁厂做工。赵世炎随后也来到这里，在巴黎成立的劳动学会移到这里来开展活动。克鲁邹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它和蒙达尼成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革命活动的两个中心。这里的施乃德钢铁厂是法国最大的机械工厂，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部分当杂工，搬运钢铁和装卸货物，另一部分被分配在翻砂、锻冶车间劳动。李立三当了翻砂工，劳动强度很大，每天要在熔铁炉旁搬动百多斤重的铸件和工具。劳累一天，所得工资仅高于学徒工，除维持低水平的生活外，就所余无几了。李立三在这里亲身体验了工人的艰苦劳动生活，清除了头脑中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工人师傅是法共党员，很赞赏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常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讲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

李立三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很明确的，但是如何革法，这是不太明确的”。

劳动学会成立时，李立三、赵世炎等明确提出：《学会》的任务是要革命。在旅法的条件下，怎样开展革命工作呢？他们当时的认识是：“第一步应先把华工组织起来”。

施乃德钢铁厂是华工的中心，在那里劳动的华工有两千多人。李立